

體制改革與文化衝撞：戰後南韓的婦女運動

文 | 黃長玲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南韓近年的性別議題屢屢佔據國際媒體的版面，從激進女性網路社群的出現，到一連串性別暴力事件引發的公共行動與論爭，乃至於今年（2022年）南韓總統大選中性別衝突成為選戰核心議題，種種現象也引發臺灣媒體的報導及關注。無論是戰後發展的經驗或是民主化的歷程，乃至於民主化後性別平等政策和體制的建立，南韓與臺灣都有許多共享的經驗。然而，在相似性之外，兩國之間婦女運動的軌跡也有重要差異。本文是對南韓婦女運動的簡短回顧，雖然體制改革與文化衝撞幾乎是所有國家婦女運動的共享經驗，但是南韓近年婦運

發展的關鍵其實是激進女性網路社群對南韓父權文化的挑戰。這些挑戰既帶來豐沛的能量，也不令人意外的引發保守陣營的反撲，然而筆者也將在本文中指出，真正有可能對南韓未來婦女運動的形貌造成重大和長期影響的是激進女性網路社群在跨性別議題上的立場。

1970年代女性勞工的抗爭¹

戰後南韓自主性的婦女運動組織在1980年代逐漸出現，然而1970年代韓國勞工運動中女性勞工的抗爭，奠定了南韓婦女運動長期關切女性勞

1 本節所討論的1970年代南韓的政治及女性勞工的抗爭，對於這個領域的研究者而言近乎常識，所以筆者不標註文中具體事件的參考出處。全文中關於婦女運動的整體性描述則多半來自筆者因研究，或是與韓國婦運界的朋友的互動而累積的訪談或是觀察結果。

動處境的傳統。二戰之後韓國雖然脫離日本殖民，但是很快就陷入分裂與內戰。1948年大韓民國和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分別成立，1950年韓戰爆發，戰事持續三年於1953年結束。在此之後李承晚主政期間，韓國的經濟發展緩慢，主要政策和當時的臺灣很像，以進口替代為主。李承晚政府的貪腐和政績不佳導致1960年代的學生示威，他下台流亡海外後，韓國曾經有過短暫的民主。1961年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上台，朴正熙在位18年，期間改採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南韓經濟開始高速發展。1960及1970年代，農業部門的資本及勞動力在政府政策下不斷湧入工業部門，而出口部門如成衣及電子業的主要勞動者多為工時長、工資低，以及勞動條件惡劣的女性。

1970年11月13日，22歲的成衣工人全泰壹，手持《勞動基準法》，在當時首爾的成衣製造業集中地，今天仍然知名的成衣時尚中心東大門的和平市場，在工人中午午休的時間，高呼「請遵守勞動法」及「工人不是機器」後自焚身亡。全泰壹的自焚是韓國戰後勞工運動的開端。出身貧窮的全泰壹中學畢業後就成為工人，自焚前因為當時他所身處的成衣製造業的惡劣勞動條件，曾經組織過工會以及向政府陳情，希望工人的處境能夠

得到改善。他因為種種努力與訴求無法得到政府及資方的回應而自焚抗議，震撼當時的韓國社會，也使得勞動議題受到向來是韓國社會運動主力的學生運動的重視。

全泰壹的自焚深刻影響了後續韓國社會運動及民主化運動的發展。自主性的婦女運動和婦女組織在1970年代雖然尚未出現，但是由女性領導的激烈勞動抗爭在1970年代的韓國工運中屢見不鮮。全泰壹自焚後送到醫院急救，過世前對母親所說的話就是請母親完成他未完成的工作，他的母親李小仙在他過世後所組織和領導的「清溪被服工會」是韓國1970年代少見的跨廠區成衣業工會，也是從1970年代到1980年代中期最重要的自主工會之一。工會名稱的「清溪」就是來自今天首爾重要觀光景點的「清溪川」，當時東大門市場附近，沿著清溪川有著成千上百的小型成衣工廠或是製作工坊。

1970年代韓國女性勞工的抗爭事件中，衝突最劇烈的抗爭之一就是東一紡織的自主工會抗爭，當時的抗爭不只是勞方與資方的抗爭，也是男性工人與女性工人的抗爭，因此除了勞動意義外，也深具性別意義。東一紡織位於仁川，僱用的工人超過千人。1972年的工會選舉中，一群女性工人

贏得了工會選舉，成為工會幹部，取代了本來與資方關係良好的男性工會幹部。隨後工會活動就不斷受到資方及男性工人的騷擾及打壓。1976年工會要進行會員代表會議討論罷工議題時，資方不斷阻撓，切斷通向會議地點的通路，意圖使代表人數不足而流會。工會堅持開會的結果是公司的保全及某些男性工人毆打女性工會幹部，但是工會仍然發動罷工。罷工期間資方不允許食物送進工廠給罷工工人，廠內的女性工人在連續三天沒有進食的狀況下，與鎮暴警察對峙，雙方僵持時站在前排的一個女工突然脫下上衣，在僅有內衣的情形下，表達對政府及資方的憤怒及抗議，隨後女工們就紛紛脫下上衣。女工們的裸身抗爭短暫的讓鎮暴警察不知所措，但是隨後警方就棍棒齊下，抗爭女工仍然遭到警方的暴力對待並且被逮捕。幾年以後，在某次工會會議進行中，一群男性工人衝進會場對著女性工會幹部及成員潑灑糞便，此一事件也促使工會幹部跟當時的在野勢力及民主化運動進行更廣泛的連結。像清溪被服工會或是東一紡織工會這樣由女性領導，主要抗爭者是女性的工會，不但使得勞動議題成為南韓民主化運動的核心議題，也使得1980年代開始浮

現的自主性婦女組織，始終關切女性勞動議題。

朴正熙對韓國的統治因他於1979年10月26日遇刺而終結。刺殺他的是當時跟他一起用餐的韓國中情局局長金載圭，因此是威權體制的內爆。兩人在用餐談事時發生爭執，而爭執的主因是對於如何處理1979年夏秋之際在釜山和馬山爆發的一連串抗爭事件看法不同²。被稱為「釜馬事態」的抗爭，起因是勞工抗爭，但是很快就得到學生運動的聲援，隨即擴大為群眾抗爭。當時的勞工抗爭跟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機所引發的經濟衝擊及韓國企業的關廠欠薪風潮有關。在那波抗爭中，由於釜山和馬山是韓國製鞋和電子業的重鎮，所以許多參與抗爭的勞工都是女性。

朴正熙遇刺後不久，韓國只出現非常短暫的權力真空，隨後在1979年12月12日，韓國國軍保安司令官全斗煥運用朴正熙所創建的軍中秘密組織「一心會」發動政變，史稱「雙十二事件」。全斗煥在軍事政變成功後成為韓國的新威權統治者，次年5月在全羅道首府光州就發生了「光州事件」。光州事件對戰後南韓而言，

2 朴正熙和金載圭的分野是，朴正熙認為釜馬事態之所以越演越烈是因為金載圭鎮壓不力，而金載圭卻認為持續鎮壓無法解決問題。

所造成的歷史傷痛僅次於韓戰。當時軍隊對人民的血腥鎮壓，因為軍政府封鎖訊息的關係，要在事件發生很多年之後，相關過程與細節才逐漸為韓國社會所知悉。然而光州事件仍然深刻的影響了 1980 年代韓國民主化運動的發展，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就是光州事件之後學生運動發展出「現場論」以及「勞學連帶」的策略，亦即學生必須與底層人民站在一起，要到底層人民生活與勞動的現場才會理解真實的韓國社會。

「勞學連帶」的策略讓許多大學生放棄學業進入工廠組織工會。當時全斗煥政府對於首爾周邊城市的「偽裝就業」採取非常嚴厲的措施。任何工人被查出隱匿大學學歷，不但會以「偽裝就業」罪論處，也會直接被列入黑名單，使其無法再在工廠就業。這個學運策略當年所召喚的學生男女皆有，而放棄學業進入工廠的女大學生也使得韓國社會中產階級的女性首

度跟勞動階級的女性真正連結³。

1985 年韓國爆發了「富川署性拷問事件」，首爾大學的學生權仁淑因為「偽裝就業」而被捕，警察訊問時對她進行性刑求。權仁淑在被釋放後，主動公開自己的經驗，並且對濫權的警察提出訴訟。然而，仍在威權統治下的韓國，媒體報導受到壓制，司法體制也並未還給權仁淑公道。一年以後，導致韓國威權終結的首爾大學學生朴鍾哲刑求案，喚起社會大眾對警察刑求的關注，權仁淑的受害經驗才隨之得到社會的重視⁴。「富川署性拷問事件」雖然在權仁淑首度提出控訴時，受到威權政府的壓抑，但是 1980 年代出現的自主性婦女組織也因為此一事件產生集結與動員⁵。

婦女運動及兩大婦女組織聯盟

1980 年代自主性婦女運動組織出現時，重要的集結都與議題和事件有

-
- 3 當年參與勞學連帶的許多大學生，有許多在威權政府的嚴查之下被捕，身份暴露無法再在工廠工作後回到大學繼續學業，也有些是民主化後就回到學校繼續學業，但是有些人繼續留在工廠而最終成為工運領袖。
 - 4 朴鍾哲於 1987 年 1 月因參與學生運動及示威被捕，在此之前他已經在 1985 年因參與示威有過被捕下獄的經驗。1987 年 1 月被捕後，在警方的刑求下身亡，威權政府一開始否認刑求，後來承認刑求但是不願說明相關真相，只懲處參與刑求的警員，激起各界不滿。朴鍾哲身亡後一系列的追悼會及要求真相的抗議活動，持續數月，最終導致 1987 年 6 月爭取民主憲政的大規模抗爭，迫使威權政府在 6 月 29 號正式讓步，發表民主化宣言，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
 - 5 傷害權仁淑的員警最終被判刑入獄，權仁淑也在赴美深造後成為性別研究者，回到韓國後在明知大學任教，後來出任韓國性別平等政策院的院長，並且在 2020 年當選為不分區國會議員。《婦研縱橫》第 93 期「在和平與安全中看見女性」的專題文章中，曾有筆者對於權仁淑教授及其作品的介紹。


關。先是 1983 年抗議女性電話接線生必須在 25 歲離職的規定，接下來是 1984 年抗議參與學生示威的女大學生在警察局遭到性騷擾，乃至於 1985 年因為「富川署性拷問事件」而抗議女性遭受性暴力。婦女團體的持續集結最終形成了新的聯盟性組織「韓國女性團體聯盟」（簡稱女聯）。女聯與另一個婦女組織聯盟「韓國女性團體協議會」（簡稱女協）的差異很明顯。兩者的差異既是歷史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女協在威權體制下受官方認可而存在，很多團體歷史悠久，成員眾多，雖然也關切女性權益，但是民主化前並不挑戰體制，民主化後的政策立場也偏向保守或是溫和。其中的成員有些是女性國際組織在韓國的分會，譬如「基督教女青年會」（YWCA Korea）或是「專業與職業女性聯盟」（BPW Korea），也有韓國本土的女性專業協會，譬如「大韓看護協會」、「大韓助產協會」、「大韓營養師協會」等等，另外也包括不同區域性的婦女會⁶。女聯的成員則多半成立於 1980 年代以後，各組織規模較小，但是與民主化運動關聯甚深，挑戰政治與社會體制，除了婦女權益以外，也常因為人權議題或是韓國的

和平及統一議題而集結或是集體發聲。其中的重要成員包括知名的婦運組織「韓國女性民友會」、「女性熱線」、「性暴力相談所」、「女性勞動者會」，以及 1990 年代以後才成立的「韓國女性障礙人聯合會」、「韓國移住女性人權中心」等等，除了議題性的組織成員外，女聯也在 37 個城市設有分會⁷。

兩個婦女組織的聯盟在韓國國內政治中也存在黨派立場的歧異，一般而言女協與保守政黨關係較為密切，而女聯則與進步政黨關係較為密切。這一點從韓國民主化以後，歷屆總統所起用來自婦女團體的部會首長，或是主要政黨不分區名單中獲得提名的女性之背景可以得知。兩個聯盟雖然立場歧異，但在與女性權益相關的法律或是政策倡議中常常結盟。民主化以後的韓國跟臺灣很像，與性別相關的法律修正或是立法，都與女性在家庭、職場或是教育環境中的處境有關，包括 1987 年制訂《男女僱用平等法》、1989 年制訂《母子福祉法》、1990 年修正民法中關於夫妻財產的分配、1994 年修正性犯罪相關法制，增加對被害者的保護，以及 1995 年制訂的

6 可以參見女協的網站：<http://www.kncw.or.kr/ko/>

7 可以參見女聯的網站：<http://women21.or.kr/>



《女性發展基本法》。基本法制訂的時間，也是聯合國「性別主流化」進程開展的時間，從此之後，各領域與性別平等相關的法律與政策改革持續進行，而其中很有代表性的是在 2005 年廢除了以男性為戶長的「戶主制」，以及在 2015 年廢除了通姦罪。

法律之外，重要的政治體制改革出現在 2000 年初中期，金大中及盧武鉉政府任內，通過攸關婦女參政的性別比例原則相關法律。金大中政府在 2000 年修正政黨法，規定各政黨不分區名單必須提名 30% 的女性，但是法律本身沒有強制性。2000 年國會選舉後，社運團體要求將選舉制度改為兩票制，而盧武鉉總統任內，國會在 2003 年組成了包括政黨代表及學者專家的政治改革委員會，討論選舉制度的改革。婦女團體針對政治改革提出性別比例要求，要求在新的單一選區兩票制下，各政黨應在不分區名單中提名 50% 的女性，以及在單一選區中提名 30% 的女性，相關規定在國會選舉的層次雖然沒有足夠的強制性，但是在後來的地方選舉中，強制性逐漸清楚。譬如在區域選

舉和基層選舉的部份（如道／廣域市議會及市／郡／區議會）則有強制性，不分區名單中性別比例不合者，選舉委員會不接受提名名單，而區域選舉部份提名到達 30% 者，則給予更多政黨補助金。

2002 到 2007 年盧武鉉政府任內，朝野政黨對抗激烈，但是在婦女參政的議題上，因為婦女團體的跨黨派合作，反而得到相當程度的進展。兩大婦女團體聯盟在規範各政黨提名必須符合性別比例原則的立法過程中，彼此合作。女聯扮演的角色尤其積極，國會修法時每天都有成員在國會盯場，確保性別比例原則的立法完成。2004 年的韓國國會選舉，是首度採行單一選區兩票制以及新的候選人性別比例原則規範的大選。各政黨提名前，婦女團體召開聯合記者會，推出一個 102 人名單，列出婦女團體聯合推薦的候選人名單，並且在名單上依照當事人的意願，列出她的政黨屬性。婦女團體此舉是為了回應各政黨宣稱並非他們不願意提名女性，而是女性不願參政，因此主動推出願意參政的各界女性的名單。102 人名單的記者會受到媒體的廣泛報導，也對各政黨形成一定的壓力。2004 年的國會選舉結果，女性國會議員的比例從原本的 6% 提升到 13%，隨後逐漸增加到 2020 年的 19%。

1990 年代中期以後，婦女團體和國家機關的關係變得更為緊密。1995 年以後政府強力推動性別主流化，和臺灣類似的是許多政策的制定都有民間婦女團體的參與。與臺灣不同之處則在於韓國 2001 年就成立了「婦女部」（英文名稱是「性別平等部」），這個專責部會的存廢在 20 年後成為了總統大選中的重要議題⁸。婦女團體與國家機關的緊密互動，尤其可見於 1997 到 2007 年之間，進步陣營的金大中和盧武鉉政府任內，國家女性主義的路線成形，也就是婦女運動者透過擔任政府職位、調度國家資源、制定國家政策，來達到性別平權。這樣的運動策略在許多國家都存在，引發的論辯也多有類似之處，但是在南韓造成的結果之一是婦女運動者或是女性主義者的世代關係緊張。

網路婦女運動的出現

金大中和盧武鉉政府時期，當韓國開始出現國家女性主義的婦運策略時，一個值得推敲的詞彙或身份也開始在韓國婦運圈中浮現，那就是「年輕女性主義者」。雖然上述兩大婦女團體聯盟女聯和女協之間並不存在明

確的世代差異，但女聯在 1980 年代出現時，已經具有年輕世代挑戰既有婦女團體的色彩。2000 年代成為婦運圈話題的「年輕女性主義者」，嚴格說來就是「網路女性主義者」。韓國在 2000 年代初期已經躍升為全球寬頻上網率最高的國家，網路媒體如百家爭鳴，也出現一些具備性別意識的論壇。網路上的集結對於身處父權體制的女性有重要的功能，許多論壇具有女性互相支持的效果。然而，在這些論壇或是網路社團中，既有對於父權體制的批判，也不乏對於婦女運動或是兩大婦女團體聯盟的批判。這些在網路世界活躍的批判者，觀點犀利但是多半不參與實體組織，她們很多人是不參與婦女運動組織的女性主義者。相關批評中，對於既有的婦運組織的批判往往是認為婦運領袖或是主要參與者多半被體制收編。

2000 年代活躍於網路的韓國女性主義者，她們對於韓國婦女運動的批評在相當程度上既受到所學的影響，也是回應 1990 年代婦女運動的發展。許多人受到解構主義去中心化思維的影響，對於參與組織十分抗拒或是保留。婦女運動的部份，如前所述，自

8 韓國的婦女部（或稱女性部），自成立以後幾度更名也有業務變動，不同政府執政期間，名稱在「婦女部」及「婦女與家庭事務部」中間來回更動過不止一次。參見婦女部網站的說明：http://www.mogef.go.kr/mi/amo/mi_amo_f003.do

1990年代以後，韓國的婦女運動跟國家的關係日益緊密，在性別主流化的風潮下，政府持續與婦女團體連結，制定新的政策及建立新的體制，婦女團體也有更多參與政策制訂的管道。在某些特定的政策領域如性別暴力的防治或是社會福利的輸送上，更往往成為政府的夥伴，形成性別政策領域中的公私協力現象。這樣的現象在臺灣以及許多其他國家都存在，它的能量和限制也都很類似。2000年代韓國網路上的女性主義者有許多著眼於婦女團體與國家機關合作的負面效應，也因為對婦女團體與國家的關係抱持批判態度，相關批評也常針對從政女性，認為她們關心黨派利益大於關心女性權益。從結構的角度而言，有些批評其實跟南韓女性參政比例不高有關。正因為女性參政比例不高，因此少數能夠得其門而入的女性，往往是資歷較為豐富也較為年長的女性，她們不但與網路上活躍的女性主義者形成明顯的世代差異，也因為資歷豐富，並不見得都具備性別意識；而具備性別意識、有婦運背景者，又可能被過度檢視。這就形成婦女參政常見的弔詭現象：女性不捍衛性別平等，比男性不捍衛性別平等往往受到更為嚴厲的批判，即使女性一般而言比男性更捍衛性別平等。

另一方面，網路女性主義者的行

為和其他的網路使用者也有共通性。韓國自2000年初期開始，許多重要的政治事件或議題得以出現或受到重視，都跟大規模的網路動員有關。最早受到矚目的動員是2002年網路發起的在首爾市政府廣場悼念被駐韓美軍撞死的兩個中學生，那次的群眾集結被認為導致了盧武鉉在總統大選中的勝利。隨後的著名案例則是2008年的反美牛運動，以及2016年要求朴槿惠下台的運動。2008及2016年的兩次示威都是燭光示威，群眾不分晝夜的集結在首爾市府到光化門一帶，而且兩次示威都不是由政黨發動群眾運動，而是群眾透過網路動員的自發性行為。若是套用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中的詞彙，這樣的群眾運動是「無大台」的，並不存在單一領導中心。這種性質使得政府或是任何政治力量要與參與者溝通協商皆非易事，因為群眾自發而來，只能自發而去，並沒有任何組織有足夠力量可以召喚這種規模的群眾或是解散他們。大規模的群眾動員，和社群媒體的特性有關，是無數網路社群共同造成的效果。

韓國的網路女性主義者也是如此，她們雖然提出對韓國性別體制的批判或是婦女運動的批判，但是即使政府或是她們本身願意，無組織的特性很難成為政府有效互動的對象，更遑論這些女性主義者本身就對於與政

府互動持保留態度。2000 年代在網路上活躍的女性主義者對婦女運動進行的討論或是批判，雖然在婦運內部引發爭議或是受到重視，但是並未激起韓國主流社會的討論，女性主義對於韓國多數人而言是個陌生名詞。這個現象在十多年之後，也就是 2010 年中期以後，因為一連串的事件而改變。下一個世代的年輕女性，在網路上不只是批判父權體制，也直接嘲諷韓國男性。然而，網路社群並不等於網路組織，它也許可以有社群成員互動或是發言的規範，也可能具備相當的動員能量，但若它只是社群而非組織，那麼無論它如何衝撞韓國的性別體制或是挑戰既有的婦運路線，都很難真的成為婦女運動的領導性力量，也很難與既有的婦女團體或是政府部門進行溝通協商。這些網路社群無法解決代表性的問題，而這正是 2010 年中期以後韓國婦運面臨的最大挑戰。

當代韓國的性別戰爭

自 2010 年中期以後，南韓進入了性別戰爭的狀態，#MeToo 運動也促使南韓女性形成跨世代的集結。對於年輕的南韓女性主義者而言，她們不再只是網路論壇的無組織批判者，許

多人同時在街頭示威以及在網路上與人論辯，在虛擬及現實空間中形成新的集結，同時挑戰父權體制。2017 年秋天美國出現 #MeToo 運動後，韓國也很快出現類似的風潮。臺灣媒體對於韓國的 #MeToo 運動多有報導，但是當代韓國的性別戰爭其實在美國的 #MeToo 運動出現前已經開打。這場戰爭的起點一般認為與網路社群 Megalia 的建立有密切關聯⁹。如同任何一場戰爭，通常戰爭的起點並非戰爭的原因，因為劇烈衝突反映的往往是長期累積的結構性問題。韓國的性別戰爭有非常清晰的網路特性，只是戰場不止於網路。

2015 年韓國發生 MERS 疫情，於是網路社群 DC Inside 出現了關於 MERS 的看板，讓網友可以交換和討論疫情。隨後網路上出現兩位韓國女性感染 MERS 但是在香港拒絕被隔離的未證實訊息，此一訊息引來許多人的批評，很多人使用了「泡菜女」和「大醬女」這樣的詞彙，社群中的女性也有人用「泡菜男」回敬，網路上彼此的辱罵與爭論後，許多女性離開 DC Inside 而建立了 Megalia。Megalia 的風格是對抗性的，社群標誌是一個嘲諷男性生殖器官尺寸的女性手勢，

9 Megalia 是 MERS 和 Egalia's Daughter 的結合。Egalia's Daughter 是挪威小說家 Gerd Brantenberg 所寫的女性主義小說。

成員不僅在網路上分享訊息及討論，也發起很多行動，包括讓美國的男性雜誌 Maxim 因為韓國版的不當封面設計公開道歉（那個封面呈現了對性別暴力的肯定）、下架韓國的色情網站（網站中很多影像是未經當事人同意的偷拍影像、報復式色情，或是性別暴力），以及便利貼運動（在許多公共場合貼上呼籲重視女性權益字句的便利貼，然後拍下照片上傳到社群共享）等等。Megalia 在性別文化上的對抗性風格，主要表現在所謂的鏡相策略（mirroring）上，亦即將男性和女性的處境直接對照置換，因此有「泡菜女」就有「泡菜男」，有戀女童的詞彙（lolini）就有戀男童的詞彙（jonnini）¹⁰。

2016 年首爾發生江南地鐵站出口附近的兇殺案，一名女性從公廁出來後被殺害，行兇者與被害女性素不相識，而行兇動機是因為兇手過去與女性相處的挫折感。監視器畫面清楚顯示兇手並未選擇在那名女性之前使用公廁的男性。換言之，這個「隨機」殺人案的目標非常清楚是針對女性。許多評論者指出這個兇案是厭女文化所導致的結果，這樣的觀點以兇案的性質而言並不意外，但是許多男性認

為將兇案與厭女文化連結，是對男性的歧視，於是男性遭遇逆向歧視的話題再度喧騰。Megalia 在 2015 年建立，2017 年文在寅於總統大選獲勝後不久，Megalia 就關閉了，它存在的時間不長，但是影響深遠。它的社群標誌，也就是那個嘲弄男性生殖器官尺寸的女性手勢，持續在韓國的性別戰爭中發酵，導致後來有人發起網路連署，要求韓國政府禁止這個標誌。從 Megalia 分出的另一個網路社群 WOMAD 引發的爭議更大，因為社群中有使用者強迫（和女性結婚的）男同志出櫃，或是嘲弄跨性別者，也有使用者從澳洲發文並上傳影像宣稱她強暴了一個男童，引來澳洲警方的調查¹¹。Megalia 的關閉和 WOMAD 參與者從 Megalia 出走，涉及當代女性主義者關於跨性別者的論辯。韓國媒體對 Megalia 關閉的報導提及社群的經營者內部對於同志議題及跨性別議題看法分歧，而 WOMAD 則採取了起源於英國某些婦女團體的排除跨性別者的立場（TERF, 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

2017 年，進步陣營的文在寅在總統大選中獲勝，選舉中的主要訴求就是要持續追求性別平權。次年年初韓

10 Lolini 是英文 Lolita 和韓文幼童（olini, 어린이）的合稱，Jonnini 是英文 John 和韓文幼童的合稱。

11 WOMAD 是 Women 和 Nomad（女性與遊牧民族）的合稱。

國爆發了 #MeToo 運動，那場運動無論是以街頭抗爭的人數、主流媒體支持的程度，或是被指控者最終的結局而言，都前所未見。國寶級詩人高銀身敗名裂、在韓國民主化運動中深具聲望的首爾市長朴元淳自殺身亡、本來被認為是文在寅接班人的忠清南道道知事安熙正入獄服刑、釜山市長吳巨敦辭職下台、知名導演金基德流亡海外後在歐洲染疫過世，相關案例不勝枚舉¹²。這些案例反映的是韓國長久以來的父權體制遭遇的劇烈挑戰。#MeToo 運動爆發後，婦女團體出現空前的團結，網路討論熱烈的同時，首爾街頭關於 #MeToo 的示威遊行人數動輒上萬。文在寅政府成立了「性犯罪對策委員會」，請了權仁淑教授出任主委，表達了對 #MeToo 運動的支持。#MeToo 運動爆發後，主流媒體持續報導不斷浮現的指控，其中有線電視台 JTBC 尤其積極。JTBC 是揭發朴

權惠閨蜜門的電視台。就 #MeToo 運動而言，無論是第一個站出來指控長官性騷擾而點燃南韓 #MeToo 運動火炬的檢察官徐志賢或是指控遭安熙正性侵害的隨行秘書金智恩，都由 JTBC 播出對當事人的深度採訪。此外，該台也訪問性侵害的研究者及對性侵害案例熟悉的實務工作者。這些節目不但引起社會關注，也等於是社會教育，讓一般民眾更熟悉性侵害的特性以及受害者的處境¹³。

網路女性社群或是 #MeToo 運動，以及後來很多女性發起及響應的拋棄束胸及不化妝運動，都指向韓國父權體制下的性別文化所造成的性別不平等。這些運動一方面引來韓國男性的強烈反彈，另一方面也彌補了韓國民主化以來性別平權政策及法制的不足。男性（尤其是年輕男性）的反彈，使得女性主義或是女性主義者在韓國主流社會逐漸成為汙名。韓國文化日報在 2021 年底的民調顯示，高達九成的 20-29 歲男性對女性主義持否定態度，而且調查中也發現年齡層越低，對女性主義所抱持之態度的性別差異越大¹⁴。韓國政府的女性政策研究院

12 以政治領域而言，韓國進步陣營在 #MeToo 運動中受創甚深。朴元淳、安熙正，以及吳巨敦都是進步陣營的政治人物。

13 韓國有線電視台的生態和臺灣不同，因為許多有線電視台是三大無線電視台的分台，或是主流平面媒體設立的。JTBC 的最大股東是韓國的主要報紙中央日報。

14 參見文化日報的調查與報導，網址：<http://www.munhwa.com/news/view.html?no=2021110201030403350001>

以及國家人權委員會所發佈的報告也有類似的發現¹⁵。年輕男性對於女性主義的反彈並不難理解，因為韓國的父權體制也重視論資排輩，加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趨勢，教育及經濟的競爭都更為激烈，因此年輕男性無論面對年長男性或是同輩女性，可能都無法覺得自己是體制的受益者。相關調查也顯示年輕男性普遍對於韓國徵兵制只徵男性不徵女性的反感。換言之，多數年輕男性或清晰或模糊的感受到自身逐漸失去體制性的優勢，或是自認自己從未享受過體制性的優勢。韓國男性，特別是年輕男性對於女性主義的反彈，在2022年的總統大選中成為重要議題，除了保守陣營候選人尹錫悅承諾當選後會廢除婦女部之外，就連進步陣營的候選人李在明都在受訪時試圖區分性別平等與女性主義，並且謹慎地對女性主義抱持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態度，這和文在寅2017年選舉時標舉女性主義有相當大的差別¹⁶。

在政治領域中，對婦女運動而言饒富意義的是#MeToo運動之後，韓

國出現了女性政黨。2020年3月8日，「女性的黨」正式成立，也引起國際媒體的報導。創黨之後，在2020年的國會選舉中，雖然沒有贏得任何席次，但是總得票數超過20萬票，得票率約為0.7%。2021年首爾市長的補選中，「女性的黨」候選人也贏得大約3萬票，得票率也是大約0.7%。然而同年年底該黨爆發內部爭議，2022年9月初該黨公開宣佈啟動解散程序，目前正等待黨員投票的結果。

韓國的女性政黨也許曇花一現，但是韓國的性別戰爭顯然並不會因為尹錫悅的當選而終止。尹錫悅雖然選舉時承諾要廢除婦女部，但是兩大婦女團體聯盟都公開抗議廢除婦女部的政策。2021年廢除婦女部的政見首度浮現時，女協立刻發出聲明，要求主張廢除的政治人物立刻撤回政見並且道歉。女協的聲明其實很有意義，因為主張廢除婦女部的看法來自保守陣營，而女協傳統上跟保守陣營的關係較為密切。然而，這個政見始終是大選時的話題，2022年1月總統大選前，女協再度發聲明反對廢除婦女部，聲

15 針對女性政策研究院調查的媒體報導，請參見：<https://www.womennews.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85048>；國家人權委員會公佈的調查結果，請參見：<https://www.humanrights.go.kr/site/program/board/basicboard/view?currentpage=1&menuid=001003001004001&pagesize=10&boardtypeid=16&boardid=7607118>

16 李在明的態度可以從韓國日報以下這篇訪談中看出：<https://www.hankookilbo.com/News/Read/A2022011921510000815>

明中還指出女協有 54 個會員團體，超過 500 萬會員¹⁷。另一方面，尹錫悅當選後，女聯不但動員韓國國內超過 600 個婦女及公民團體，也動員上百個國際組織，發出聲明抗議廢除婦女部的政策¹⁸。尹錫悅雖然請婦女部提出相關規劃，但是何時廢除婦女部並沒有明確的時間表，而他當選後民意支持度快速下滑，未來會如何處理婦女部及其相關業務還有待觀察。由於韓國的憲政慣例是每任總統都會調整部會，因此最後婦女部若是真的廢除，也可能只是保守政黨執政期間對於性別平權相關政策採取消極立場，這點在過去李明博政府及朴槿惠政府任內都曾經發生，也曾經遭到婦女團體的批評。

韓國的性別戰爭以 2022 年大選的結果來看，仍然在持續進行中。像 Megalia 和 WOMAD 這樣的女性網路社群，雖有少數成員的行為引發社會爭議，但是確實衝擊了韓國的父權文化。若以 Megalia 成功抗議過的案例而言，放在很多其他國家的政治情境中，都是婦女運動的成就。網路上的性別衝突到了 2020 年代毫無疑問已經

進入韓國政治，線上的發言者也許可以匿名，但是線下的發言者卻不可能隱身。所有在這場性別戰爭中的作為，都將考驗韓國的民主。

結語

戰後韓國的發展，在許多經驗與歷史時程上幾乎和臺灣同步。韓國婦女運動和臺灣相近的地方是許多性別平權的相關政策得以施行，是婦女團體長期倡議後，同時進行立法遊說及政策參與的結果。兩國的婦運軌跡和經驗也有相當明顯的差異，雖然臺灣和南韓婦運的差別有待更深入的研究，但是可以觀察得到的現象是，相比於南韓，臺灣的婦女運動既沒有明顯的世代衝突，也很少選擇激烈對抗的策略。臺灣網路上的性別論戰或是厭女現象雖然也很普遍，但是臺灣沒有出現激進的女性網路社群。年輕世代的臺灣男性，也沒有像韓國男性一樣，絕大多數對女性主義明確持否定態度，更沒有形成組織性的力量挑戰國家的性別平權政策。再者，臺灣的婦女運動在同志和跨性別議題上多半是處於支持或是結盟的狀態，韓國的

17 女協要求道歉的聲明：http://www.kncw.or.kr/admin/bbs/board.php?bo_table=02_03&wr_id=142，要求停止廢除婦女部的聲明：http://www.kncw.or.kr/admin/bbs/board.php?bo_table=02_03&wr_id=147

18 女聯的聲明分別如下：http://women21.or.kr/index.php?mid=statement&ckattempt=1&page=4&document_srl=19436；http://women21.or.kr/index.php?mid=statement&ckattempt=1&page=4&document_srl=19468

女性團體中幾度爆發的關於同志和跨性別議題的爭議，在臺灣的婦女運動中即使有人討論，也從未有過任何團體採取排除同志或是跨性別者的立場。在韓國進步陣營中頗具影響力的媒體京鄉新聞 2022 年 7 月所做的民調，除了顯示年輕世代對女性主義的巨大性別差異外，也顯示韓國不少年輕世代認同女性主義的女性，對跨性別議題並不支持，也不認肯跨性別者是社會弱勢，並且對於男同志和女同志有不同程度的認可及支持。

雖然兩國的婦運經驗不盡相同，但是需要共同面對的挑戰卻很類似。首當其衝是數位性別暴力。科技不斷創新的同時，對於女性的各種性剝削與性暴力也隨之日新月異。韓國的 N 號房事件以及臺灣的深偽換臉事件（deepfake）都引起媒體重視，也是網路上時時刻刻都在發生的性別暴力中少數得到處理的案例。兩國也需要面對的是體制與文化的落差。無論是政府政策或是國家法律，它們和性別文化的關係是長期互動、互為因果的。不具備性別平權意識的人，不可能產生具備性別平權價值的法律與政策，

而具備性別平權價值的法律與政策，又會對人們的性別意識產生影響。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個別女性或是婦女團體如何與體制協商，是一個沒有明確答案的問題。南韓女性在網路社群中所表現的對抗性，未嘗不是久經父權體制壓迫後所表達的憤怒。臺灣雖然沒有發生像南韓一樣的性別戰爭，但是體制與文化的落差始終存在，國家法律對女性權益的保障（譬如女兒與兒子享有相同的繼承權），在沒有性別平權的社會文化中，就無法真正落實。

性別平權價值在當代逐漸成為普世價值，而每一個國家的婦女運動都無可避免的鑲嵌在自己的社會與文化脈絡中，但是彼此參照、互相學習是二戰以來許多國家的婦女運動曾經有過的經驗，對於歷史經驗與體制發展與我國相近的南韓，其婦女運動的經驗也許更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